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养老 社会资本获取机制与政策支持

王 华¹, 殷旭辉^{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关键是解决养老资源短缺问题。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审视农村养老资源问题, 发现社会资本动员遵循“同质原则”, 养老政策发展的逻辑理路契合社会资本动员机制。在城镇化初级阶段, 农村劳动力外流引发养老困境, 农村养老问题表现为资本和回报欠缺; 在城镇化中级阶段, 随着农村养老资源不足问题逐渐凸显, 国家积极推进社区养老, 补充“类家庭”的社会资本; 在城镇化高级阶段,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农村养老的内生资本, 以相关政策“支持家庭”, 加快提升农村老人动员最佳社会资本能力, 构建保障、健康、参与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 农村养老; 社会资本; 获取机制; 政策支持;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07(2025)02-0045-08

2023 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 15.4%^[1]。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标准, 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近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老龄化城乡倒置使得养老问题的焦点和难点集中在农村, 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相对短缺是形成养老压力的症结所在。城镇化进程中, 子女缺位使得部分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和情感寄托, 进而产生老年人饮食将就、健康被忽视、精神消极的老年生活情景^[2], 这不仅与我国农村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相符, 也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不相容。因此, 如何使农村老人获得更适宜、经济且可持续的社会资本就成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建构合理农村养老政策框架的关键。本文通过纵向考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获取机制, 系统阐释养老政策发展的逻辑理路, 以期对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养老提供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缺口

中国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问题是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 既有研究成果丰富且视角多元。从社会资本困境形成的根源来看, 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下, 农村养老遭遇着制度失衡^[3]、文化失落^[4]、子代失守^[5]的三重压力, 从而使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困顿局面。一是传统家庭养老资本外流^[6]; 二是外部社会资本输入有限^[7]; 三是资本供给难以满足多元需求^[8]。而且, 现有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供给还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性, 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社会环境较差, 养老资本面临更大挑战^[9], 据调查, 欠发达地区的养老供给主要为经

收稿日期: 2024-05-09 DOI: 10.13968/j.cnki.1009-9107.2025.02.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2XJC71000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A019)

作者简介: 王华,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与区域发展。

* 通信作者

济供养等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供给相当匮乏^[10]。

对于提升农村养老社会资本的供给效率,学界主要给出了“内生观”与“补偿观”两条路径。“内生观”主张改善自我及家庭养老能力,有学者建议从制度设计上优化集体成员权、发展农地制度与社保制度等,从而完善农村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11];还有学者对增进代际支持和家庭功能^[12]及农村养老秩序重构^[13]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补偿观”主张嵌入社会资本,或以政府为供给视角,侧重探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4]、养老资源供需匹配与供给效率等^[15];或以社区为供给视角,侧重呈现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意愿^[16]、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17]及支持路径等^[18]。

现有研究集中在农村养老社会资本的供给视角,缺乏对于农村养老社会资本获取机制(动员-回报机制)的分析。如何发展农村最重要、最便捷、最适宜的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是当下中国农村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供给并不完全等同于养老结果,其转化效率受到老人资本动员能力的影响。换言之,即使制度供给、社会支持、村民帮扶等社会资本持续投入农村,也难以直接转化为积极的养老效果^[2],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老人能够动员社会资本并获得回报的能力,特别是情感、信任、参与、尊重等非物质性的社会资本的动员与参与。因此,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系统探究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获取机制,对科学预判农村养老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农村养老选择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资本^[19]¹⁹,包括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以及结构性位置等,行动者不能直接拥有它们,因此在使用中可能存在互惠和补偿义务。林南从个体视角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决策造成的决定性影响,认为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决定着其行为逻辑^[19]⁵⁶。科尔曼则从集体行动视角切入,指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可为结构内部的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20];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1]¹⁹⁷,指出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加强群体活动来实现共同利益^[22]。无论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指向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支持社会资本是对人有益的信任、参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源。因此,文中的社会资本取用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概念,指能够为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支持的家庭成员、社区亲友以及外部的各种社会网络和制度性安排等。

人们为了增进自我利益,就需要动员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动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们拥有社会资本;二是人们愿意并能够动员这些社会资本。由于社会互动遵循“同质原则”,倾向于在有相似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主体间发生^[19]⁴⁰,因此,互动、资源、情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形成一种自愿的合作(见图1)。这是一种以维持资源为目的的情感性行动,资源特征越相似,互动中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小,互动也更为自然和顺畅;反之,则需要借助一定媒介的力量来实现,如金钱、舆论、制度约束等。作为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层面的,是参与者能切身感受到的共同价值观念;对于违规者的惩罚也不是国家法律,而是将其排除在社会团结与合作的网络之外^[21]^{198,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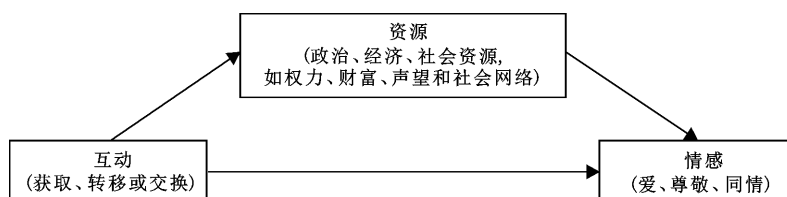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互动的同质原则^①

社会网络与结构性位置的差异使得人们对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获取能力,从而呈现出社会资本在群体

^①资料来源:参考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第40~44页整理而得。

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两种表现:一是资本欠缺,指一个群体与另一群体相比较,存在资本数量或者质量上的不足;二是回报欠缺,指一定质量或数量的资本对于不同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回报或结果^{[19]101}。资本欠缺是由于投资差异或者机会不同造成的;回报欠缺是由于人们对资本动员的差异。社会群体间的资本不平等既可能是资本欠缺,也可能是回报欠缺,或者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资本的的非平等性会导致社会生活质量的不平等。

农村养老问题可依据社会资本获取机制构建研究框架(见图2)。首先,梳理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指出在城镇化不同阶段,农村老人可能获得的包括家庭成员、社区资本(社区团结和信任的基础、规范习俗等)、制度性安排等支持性条件。其次,剖析社会资本的获取机制。解析农村老人如何动员社会资本,以及能够获得何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动员有两种形式,即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表达性行动是维持资源的行动,是相似资源的同质性行动,它可以为老人带来身心健康、生活满意等情感性回报。工具性行动是获得资源的行动,是非相似资源的异质性行动,它可以为老人带来财富、饮食、锻炼、护理等工具性回报。虽然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难以分割,彼此相容,但是表达性行动比工具性行动更重要,它是行动的首要动机和首选形式。最后,研究社会资本影响下的农村养老政策走向。通过考察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人获取社会资本的情况,系统阐释为何国家在城镇化中级阶段提供农村养老补偿性政策,以及高级阶段农村养老发展性政策,揭示农村养老政策的发展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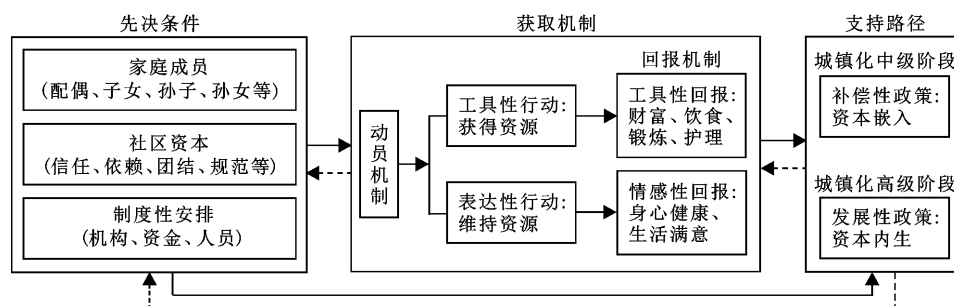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资本研究框架^①

三、社会资本问题引发农村养老政策调适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战略而逐渐显现的,是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集中后导致的阶段性困境。国际社会城镇化水平划分标准,以城镇化率40%和60%为节点,人口空间转化特征为“分散聚集”(城镇化率小于40%)、“集中聚集”(城镇化率为40%~60%之间,含40%)、“聚中有散”(城镇化率达到60%以后)^[23]。参考这一标准,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划分为城镇化初级(1978—2002年)、中级(2003—2016年)、高级(2017年至今)三个阶段,以此说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养老社会资本对养老政策的影响。

(一)城镇化初级阶段:农村家庭社会资本脱嵌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人口大流动与乡村结构调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主要特征。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攀升,从1978年的17.92%上升为2002年的39.09%^[24],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口由乡村到城镇单向流动^[25],农村代际居住空间被重构,传统家庭照料资本逐渐脱嵌。老人的晚年生活以本土独居、孤寂留守为主要形式^[26],由此也引发了农村养老社会资本危机。

^①资料来源:参考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第236~238页整理而得。

该阶段社会资本困境包括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两个方面。其中,资本欠缺来源于长期城乡二元格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农村集体养老保障退出后,国家对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趋于收紧^[27],而市场对于这类投资大、见效慢、回报低的准公共产品缺乏供给意愿,导致农村养老的社会网络及社会支持存在着资本量和质上的不足。回报欠缺来自代际支持弱化。由于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子代难以提供长期照护。分家别居增加了养老的时间、距离和机会成本,住得越远,对老人的支持越少、情感上越疏离、关系上越淡化^[28]。回报欠缺说明即使具有社会资本,老人也不能动员最好的社会资本,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感到缺乏资源或能力回报这些恩惠^[29]。

由于子女照护的长期缺位,农村老人和子代之间的共同话题、情感参与越来越少,互动减少削弱了共享情感,共享情感越少也反过来影响了互动。当共同的生活特征和生活方式基本改变,双方为了维持同质交往和互动所需的努力都在增大,老人会通过提供金钱来吸引和增进互动。年老体衰使老人逐步退出了社会生活,而照料资本的缺乏逐渐蚕食了他们精神上的尊严感、被需要感,引发生活的无助感,严重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由于难以动员社会资本,多数老人只能退守自我养老,一旦出现长期照护需求,老人家庭面临严峻考验,不少农村老人年老失能时境遇堪忧^[30]。

因此,在城镇化初期,不论是资本欠缺还是回报欠缺,都体现出因为社会资本维系过程中的无法持续而导致农村老人享受不到晚年生活照料,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还可以维持自我养老,当年事渐高,养老矛盾就凸显出来。这一时期农村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的症结不仅是资源的匮乏,更是社会资本获取机制失灵。这种社会资本的非平等性导致农村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缺乏保障,成为城镇化道路上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城镇化中级阶段:“类家庭”社会资本补偿

2003—2016 年的十余年间,中国处于城镇化中级阶段,城镇化快速提升,并且城乡关系由城市偏向型政策下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并将其列为“五个统筹”之首,强调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其最终目标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局面。国家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同时出台政策文件逐步放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如《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在政策带动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从 2003 年的 40.53% 攀升到 2016 年的 58.84%^[24],提高了 18.31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 1.41 个百分点,增速高于上一阶段 0.53 个百分点(见图 3)。与城镇化初级阶段主要以低成本就地城镇化不同,本阶段主要特征是异地城镇化和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31],由此引发的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资本短缺,农村养老问题成为公共性问题^[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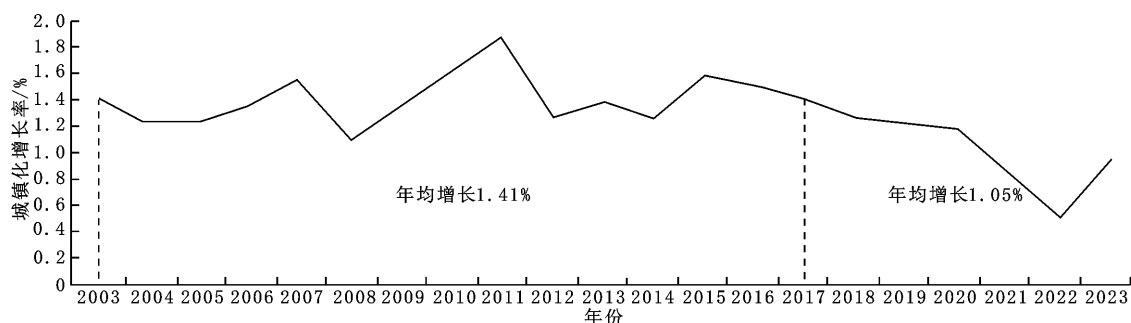


图 3 2003—2023 年中国城镇化增长率①

为了弥补农村家庭养老能力不足,国家主张准公共性组织积极介入并承担部分养老功能。如 2011 年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同年,《社区服务体系规划(2011—2015 年)》提出“继续开展农村社区服务试点,加强资源

①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得出。

整合”,并重点发展面向农村老人的照料、帮扶等服务。2013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大农村养老服务投入,“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机构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2016年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提出,推进城乡社区社会服务,加快城乡社区日间照料机构建设,推动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于是,各相关部门快速跟进农村养老工作,2013—201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30亿元,支持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33]。这些重大举措旨在搭建依托村社的社会资本补给平台,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脱嵌问题。

我国有着悠久的互助养老传统,这种信任、合作、互惠的参与网络是长期互动博弈的结果,构筑了国人“守望相助”“和亲睦族”“义以为上”的社会资本。当下农村依然是“沾亲带故”“聚族而居”的“亲缘社区”^[34],有着“类家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帕特南指出,“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21] 197}。农民在资源相似的社群里能够获得互惠的情感交流和社会认可,形成了“互动、资源、情感”的自愿合作。在进城无法安居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通过回乡建房和举办各种仪式等方式获得其主体意识和生活价值,村社依然是农民精神上的归属与寄托。由于资源和生活方式相似,老人通过互动可以获得信任、情感的共鸣与共情;反过来,这些社会资本也维持了农民村社生活的面向^[35]。

因此,国家依托村社发展补偿性政策,在加强村社公共性的同时,不断提升其养老资源整合和互助养老能力。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各地村委会、村民组织等准公共组织动员社会资本,积极探索“互助幸福院”“时间银行”“委托服务”等养老举措,先后涌现出如河北邯郸“肥乡模式”^[36],浙江嘉兴“银龄互助模式”^[37],湖北赤壁“曙光合作社模式”^[38]等。这种“类家庭”社会资本补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老人生活照料问题,有效缓解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子女回报欠缺^[39]。从其运行逻辑来看,首先,“类家庭”社会资本补偿链接多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社会资本先决条件。如邯郸肥乡就是按照村级主办、政府支持的原则,整合现有医疗资源建立“康复小屋”,联合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开展养老服务等,实现多主体资源合作输出^[36]。嘉兴“银龄互助模式”以村“两委”成立“银龄互助”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和指导,借助村老年人协会负责具体实施,从而将村“两委”、志愿者等多元主体链接起来^[37]。其次,“类家庭”社会资本补偿带动互助养老的情感性行动,契合了社会资本获取机制。如“肥乡模式”在健康老人中开发虎头鞋、十字绣、剪纸等手工制作,并帮助幸福院老人为手工制品注册商标、打造品牌、展示销售等服务。“曙光合作社模式”以“合作社+农村互助养老”实施集中供养^[40],在土地流转后,老人每年的养老费通过有偿劳动冲抵,健康的老人可到合作社务工,也可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这样,“类家庭”的互助养老模式通过引导和鼓励农村自身力量养老,实现老人在“同质”交往中的情感性回报,满足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价值感需求。

(三)城镇化高级阶段:家庭社会资本内生

从2017年至今,我国城镇化迈入以城乡融合为特征的高级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乡村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些重大政策旨在推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以实现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增速逐渐放缓,自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个百分点^[24]以来,连续7年的城镇化增长率分别为1.4%、1.26%、1.21%、1.18%、0.83%、0.5%、0.94%,年均增长率为1.05%(如图3所示)。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政府鼓励返乡创业并有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跨省外务工人员规模逐渐下降,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主的就地城镇化特征明显^[31]。于是,要素有限流动、公共产品分异等现象逐渐消解,农村养老资本需要获得新内涵与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支持是我国老人养老保障和生活照料的重要资本,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是适应我国发展实际、顺应广大老年人意愿的必然选择^[41]。实际上,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从未动摇^[42],撇开乡土文化和面子因素的影响,对于绝大多数老人而言,家庭是情感联系最密切、精神释放最彻底的社会单元,是老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从获取机制上看,老人基于互动的“同质原则”,应该优先考虑使用家庭资本。家庭互动隐含着交换情感、信任、尊重、道德等具有特

定价值的事务,这些行动促进了彼此的利益,使老人获得了健康、愉悦、安全、参与等回报。家庭作为一个集体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抚慰上的共享与协作,使拥有相似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的家庭成员互动频繁且效果满意。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两项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中国养老问题放在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下,在充分考虑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关注增强家庭社会资本内生的发展性政策。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子女赡养父母支出的个税抵扣。2019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2021年,《体系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同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对赡养负担重的零就业家庭成员,按规定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这些纲领性文件指出“支持家庭”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有效方案和实践逻辑。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下农村养老政策应围绕“家庭资本”重建,实现三大转变。一是政策对象从“老人中心”转向“家庭中心”。“老人中心”视角下政策设计往往忽视子代作为家庭养老重要参与者的生活及发展需求,割裂了子代与父代之间本身固有的资本迁移关系,更容易出现农村养老“逆反哺”现象。“家庭中心”强化养老“互动”属性,鼓励子代与父代就近居住,聚焦子代在养老照护中可能存在的时空缺位问题。二是政策内容从“工具主义”转向“情感主义”。“工具主义”视角下政策侧重异质性行动,即借助一定媒介如金钱、制度约束、舆论等,实现财富、饮食、护理等工具性回报。“情感主义”视角下更为关注同质性行动,注重老人健康、参与、满意等心理需求。三是政策目标从“养老本位”转向“生计本位”。在我国特定国情下,养老从来不是单独出场的议题,家庭养老始终与家庭生计相互捆绑,彼此支撑、相辅相成。只有建立“过日子”与“养老”一体的支持性政策,才能更好地服务农村养老工作。

实践中,家庭社会资本内生可由乡村振兴赋能。其一,从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来看,子代在场是家庭养老的基础。各地方政府可以借助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相关政策,倡导代际就近居住,保障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本。如根据《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等政策精神:一方面按照“服务-提高-富裕”小农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政策扶持,加快提升小农户经营能力,筑牢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如各地针对回乡创业人才在小额信贷、土地流转、厂房租赁等方面出台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助推专业人才回流,服务乡村建设。其二,从社会资本的获取机制来看,“同质性”互动是实现农村家庭养老目标的重要手段。高质量的农村家庭养老要依托子代与父代之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重建双方的生产合作、生活协作,这样才能形成共同的话语体系。目前的难点在于老人价值的再开发,如何使老人重获家庭成员的需要和尊严感,子女在贴心陪伴中也能收获可持续生计、代际认同和情感提升。一是发展共享价值。各地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发展如乡村文化旅游、乡村康养、乡村手工艺等老少结合的生态产业,将老人农事经验与现代经营理念相结合,打造老人家庭式经营产业模式,形塑子代与老人的价值共同体。二是推动智慧养老服务。智慧养老服务进入乡村的堵点在老人,老人掌握信息技术不仅能享受智慧养老福利,也可以更好地发展“家庭产业”。各地可调研老人家庭需求,完善智慧养老的相关政策,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适老性”,精准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服务。三是创设互动场域。“家文明”是“乡风文明”的基础和抓手。各地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应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如集体拜年、赛龙舟、粽子节、剪纸手工艺展等能够增强家庭凝聚力的乡村文化活动,提升家庭互动氛围和合作意愿,建设乡风文明、美丽宜居的乡村软环境。四是增进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是提升老人生命价值感的重要方面。各地在健全村民议事、办事和监事体系的同时,注重吸纳老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维护老人权益和尊严。总之,应借助乡村振兴,进一步支持老人及其家庭,使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仅“助老”更要“用老”“智老”“乐老”,助推乡村从“养老”的“功能中心”向“价值中心”转变。

四、结 语

社会资本理论给出了阐释农村养老选择的偏好次序,这是除经济、文化等因素外,研究农村养老决策的又一视角。由于养老社会资本的动员遵循“同质原则”,互动、情感、资源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同质化程度越高,互动越频繁,情感互动效果越好,这恰好说明家庭、自我养老等同质性资源供给模式必然成为农村养老首要选择,村社养老能够成为家庭养老的延伸,机构养老即使具有完备的医疗条件和娱乐设施也因其异质性资源属性而难以取代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

社会资本理论预判养老政策导向,一定阶段的养老政策要符合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养老条件。在城镇化初级阶段,农村养老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养老问题既表现为资本不足,也表现为回报缺失;为了解决农村养老困境,在城镇化中级阶段,国家积极推进补偿性政策,依托村社整合社会资本,以弥补家庭养老不足;到了城镇化高级阶段,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养老资源供给高质量发展成为可能,各地应围绕“支持家庭”细化养老政策,创设各种软硬条件助推家庭养老资本回嵌与内生。

社会资本理论能够从社会资本的“动员-回报”视角剖析农村养老难题。从该视角看,社会资本动员在于实际获得感,农村养老不仅要关注饮食照料、健康护理等工具性回报,更要注重情感、信任、尊重、参与等情感性回报。因此,社会视角与供给视角、供需视角相比较,它能更全面考察养老资本获得效率,有助于阐释和解决当下农村养老的社会资本“有而不用”“用而不满”等心理层面问题。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4-02-29)[2024-03-16].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 [2] 许兴龙,周绿林.多层次资源供给对农村老年人积极养老的影响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06):57-65.
- [3] 蒋军成,黄子珩.乡村振兴战略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融合路径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1(06):70-76.
- [4] 黄健元,姜丽兰.农村家庭养老服务与孝文化演进[J].重庆社会科学,2016(09):64-72.
- [5] 郑雄飞,吴振其.孝而难养与守望相助: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问题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43(02):147-154.
- [6] 桂华.城乡关系视域下农村养老体系建设[J].学术论坛,2023,46(03):12-20.
- [7] 候简.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生成的关系域及优化策略研究[J].农村经济,2023(02):116-125.
- [8] 张志元,郑吉友.我国农村失能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05):102-108.
- [9] 石人炳,王俊,梁勋厂.从“互助”到“互惠”: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老年照料的出路[J].社会保障研究,2020(03):34-40.
- [10] 张邦辉,杨乐.贵州省劳动力流出地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供需现状研究——基于毕节市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7(02):97-103.
- [11] 李辉.农村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及其社会功能[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06):114-124.
- [12] 苏运勋.女儿养老:双系家庭转型视角下的探讨[J].兰州学刊,2022(10):152-160.
- [13] 罗茜,贺雪峰.陪伴养老:家庭功能化与农村养老秩序重构[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01):126-132.
- [14] 张志元.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11):1-7.
- [15] 陈显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11):8-16.
- [16] 聂建亮,曹梦迪,吴玉锋.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互助养老实现——基于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视角的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06):52-66.
- [17] 王辉.农村互助养老长效机制: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02):65-75.
- [18] 辛宝英,杨真.子女外出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意愿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22(05):16-30.
- [19]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 [20]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02.

- [21]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2] 常桂祥,陈东霞.融通与互动:社会资本与协商治理的内在逻辑[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05):16-27.
- [23] 倪鹏飞,徐海东.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城镇化[J].改革,2022(08):98-110.
- [2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EB/OL].[2024-03-23].<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 [25] 王政.非农化与城镇化不同步的结构性观察[J].宏观经济管理,2021(11):78-84.
- [26] 李俏,朱琳.农村养老方式的区域差异与观念嬗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2):93-102.
- [27] 王增文,张文雅.国家—家庭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3(04):11-19.
- [28] 慈勤英.家庭养老:农村养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02):12-15.
- [29] 熊波,石人炳.长期失能老人照料决策研究——以个人资本为视角[J].南方人口,2012,27(05):17-23.
- [30] 贺雪峰.应对老龄社会的家庭农业[J].人文杂志,2017(10):103-109.
- [31] 李刘艳,邓金钱.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逻辑主线与未来进路[J].经济学家,2024(03):87-97.
- [32] 郑文换.构建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依托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从制度整合和社会整合的角度[J].人口与发展,2016,22(02):108-112.
- [33] 民政部.民政部对“关于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的建议”的答复[EB/OL].(2018-09-27)[2024-03-25].<https://xxgk.mca.gov.cn:8445/gdnps/pc/content.jsp?mtype=4&id=115612>.
- [34] 刘智勇,贾先文.传统与现代融合:农村养老社区化模式研究[J].江淮论坛,2019(03):72-77.
- [35]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21.
- [36] 民政部.互助养老模式破解农村养老难题[EB/OL].(2022-04-14)[2024-02-28].<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6526/content.html>.
- [37] 嘉兴市民政局.嘉兴市“银龄互助”活动在社区、农村深入开展[EB/OL].(2013-01-20)[2024-02-19].https://mzj.jiaxing.gov.cn/art/2013/1/20/art_1229578436_58878849.html.
- [38] 杜鹏,安瑞霞.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下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03):50-57.
- [39] 刘妮娜.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1):121-131.
- [40] 黄柱.官庄村有了新型养老院[N].咸宁日报,2018-01-19(01).
- [41] 李纪恒.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N].光明日报,2020-12-17(06).
- [42] 程燕蓉,慈勤英.家国一体:在乡村振兴中重塑家庭养老[J].宁夏社会科学,2022(04):166-172.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Support for Rural Elderly Ca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ANG Hua¹, YIN Xuhui^{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2.College of Marxism,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 is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elderly care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 resources, and finds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follows the “homogeneity principle”, and the logical path of rural elderly care policy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urbanization, the out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leads to the dilemma that rural elderly care is manifested as lack of capital and lack of return. At 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as the shortage of rural elderly care resources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tate actively promote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to supplement the social capital of “family like”. When it comes to the advanced stage of urbanization,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ables the endogenous capital of rural elderly care,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for “support families”, accelerates the ability of rural elderly to mobilize the best social capital, and builds a secure, healthy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elderly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rural elderly care; social capital; acquisition mechanism; policy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张洁)